

## 中共福安县组织史概述

朱树根

福安县地处闽东北各县的中心。境内东北、西北部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中、南部丘陵起伏，平原港湾交相错落，浩瀚赛江由北向南直贯境中，经三都湾注入东海。福安山肥水美，特产丰富，孕育着50万汉畲两族人民。

长期以来，福安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曾自发地进行过无数次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早在1635年，福安就爆发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斗争。此后三百年来，这种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安各界群众在进步青年学生的影响下，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1927年，在中共党员陈毓麟、国民党左派人士叶鉴青等人的发动领导下，福安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农革命运动。虽然这些斗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奠定了斗争基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批在外地求学的福安籍青年学生，接受了新的思想，陆续返回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杰出的代表有王骏声、郑眠石、黄元起、缪邦镛、马立峰等人。他们的启蒙工作，促进了福安人民的觉醒，对后来福安革命起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共福安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福安的革命，福安的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应运而生的。

为了开辟闽东革命根据地，发动闽东人民的革命斗争，1928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在闽海道如以福州为中心，应由日常斗争中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向福宁府及闽清、永泰、连江、长乐、古田发展”。1929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全会决议福建政治现状与党的工作总方针》和7月2日《目前党的主要策略与今后工作总方针》两个文件更是明确规定“福宁区以福安为中心”。同年五、六月间，福安第一党组织——福安党小组在中共福州市委的领导下在福州建立。党小组建立后，其中两位成员被留在福州从事地下活动，另二位被派回福安，在城关一带开展工作。1929年8月（另一1930年下半年），在福安城关建立了中共福安县委。中共福安县委是“二战”时期闽东地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的县一级组织，它为后来福安革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

1930年，随着党的基层支部组织的建立，县委领导成立了2个基层区委。但是，由于当时全党执行“立三路线”，福安党组织也深受影响，举行过未遂暴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意志消沉。

为了改变福安革命的沉寂局面和转移福安县委的工作重心，1931年2月2日，邓子恢（林祖育）在福州召开福安工作讨论会，改组了福安县委。5月和8月，他又二次到福安溪

柏一带领导农民运动，在农运中建立和发展了农会和党的基层组织，改变了过去忽视工作的组织基础，把福安党组织的工作重心从城镇转向农村。

由于县委改组，又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福州市委经常派干部到福安巡视和工作，加强了对福安县委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1年7月，党员由80人增至181人，支部由20个增至42个，成立了4个区委。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在农村获得发展，而且还深入到国民党武装系统中，在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中发展了党员，在民团和警察大队中建立了支部。此外，还派人到宁德三都，屏南、寿宁等县去工作，并且建立了一部份组织。团县委、秘密游击队、船工会、县农会也相继建立。

随着福安人民革命运动的深入进行，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宁德、屏南、寿宁等县部份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1931年8月（另一说1932年11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安成立。至此，福宁府各县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同年9月，虽然南区13个乡1000多人参加的抗麦债及平巢斗争遭到了挫折，全县区委的数量降到3个，支部降到20多个，但党员人数却从原来的181人发展到280多人。由于福州中心市委认为斗争受挫是“同志们右倾不敢领导斗争，致发动群众起来非常不充分”，“继而又犯了立三路线而跑上盲动的武装斗争”所致。加上1932年春，福安县委“又发生党内纠纷”，一部份人组织反县委的组织，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因此导致了同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作出“在斗争中要改造福安的党和群众组织”的决定，并派曾任过省委候补执行委员，团省委秘书长的邱小村到福安改组县委。

县委改组后不久，福州中心市委又派江平、陶铸、叶飞等到福安巡视和工作，进一步加强了福安党组织的领导力量。陶铸到福安后，按照福州中心市委的布署，于7月份把因斗争坚决而又无家可归的几十个人组织起来，建立了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点燃了闽东北工农武装斗争的烈火，实现了闽东北的工农游击运动。

1933年2月，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不幸被捕。三四月间，福州中心市委因福安县委“领导工作犯了错误”，在市委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同时，改组了福安中心县委，并为福安派了些干部、提拔了些新的干部。这之后，由于福安中心县委个别主要领导人英雄主义思想严重等原因，同年7月，中心县委再度改组。

在1932年春至1933年冬这一时段中，由于县委曾出现过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部份同志组织反县委的组织，一部份同志又在福安南区另立组织，造成党内的不统一，给福安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影响。1932年3月，全县有3个区委13个党支部66名党员，到8月，只剩11个支部50名党员，1932年冬才发展到4个区委和一个特支，1933年4月全县有16个支部时，党员人数也才100名左右。这一时段的党支部数和党员人数都没有达到1931年秋的水平。陶铸在193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福州市委（总）报告》中，在谈到福安党组织是削弱的同时指出：“这不能说是我党工作在群众中的退步，而主要的是领导不好的问题”。

1933年秋以后，福安中心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领导农民暴动、壮大武装力量上，通过广泛、深入的苏维埃运动来建设党，壮大党的力量。同年8月1日福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红色政权——“福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北区建立了17个乡村的革命委员会政权。10月22日甘棠暴动后，不仅组建了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五支队，甘棠附近的村庄也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些红色政权的建立，为福安党组织输送了许多先进分子。为了适应党的组织发展的需

要,1933年底,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安与宁德、霞浦、寿宁毗连地区建立了安德、福霞、福寿3个边委,此外,还建立了中共福鼎县委。

1933年底至1934年冬是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革命的鼎盛时期。1934年1月1日赛歧暴动后不久,福安中心县委将在福安创建的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五两支队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北第二独立团。在各区村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的基础上,同年2月,中心县委又在福安东区的日山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一说福安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此后不久,福安境内就驻有10个区委和10个区的苏维埃政府。4月,共青团福安中心县委宣告成立,安德、福霞、福寿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团中心区委。尽管1934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遭敌破坏,福安中心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但在叶飞、马立峰、占如柏、曾志等人的领导下,福安的革命运动仍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四、五月间,驻福安境内的福霞、安德、福寿三县相继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

同年6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和闽东苏维埃政府在福安柏柱洋成立,随后特委又在福安与霞浦毗连的福安东区建立了中共福安县委。7月,继共青团闽东特委成立后,安德、福霞、福寿等县相继成立了团县委。共青团安福县委也于是年8月成立。9至12月,福霞、安德、安福三县相继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从1933年底至1934年底短短的一年中,福安境内就驻有4个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有24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00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军事、土地、文化、财政、肃反、粮食、交通7部或7部委员,各级政府委员、主席、副主席都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权体系。武装方面,县有独立营,区有游击队、警一连、肃反队,乡村一级也相应成立了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区乡的团组织、妇女组织、贫农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也应运而生。福安党组织在全县范围内发展党员1000多人。广大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群众,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使福安成为闽东苏区的中心。

在这一时段中,由于福安党组织内一些领导同志存在排外思想,搞宗派、闹分裂,从而也影响党的组织建设。当福安党组织如实向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汇报存在的问题,希望得到上级的重视和帮助,以便尽快纠正的时候,反而遭到无理指责,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县委有了这样明路线的意识与估计所致”。由此,福安中心县委与临时省委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持续到1934年4月,临时省委因叛徒出卖,遭敌破坏才不了了之。

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苏区的蓬勃兴盛,引起了国民党福建当局的极大恐慌。1934年冬,国民党先后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对闽东苏区进行残酷的“围剿”,福安苏区遭到严重摧残,各级党政军群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但是,福安的党组织,福安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所吓倒,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在福安洋面山召开会议,做出了跳出包围圈进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后,转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初期,原驻福安境内的4个县委都机智地跳出了包围圈,转移到福安与宁德、周宁、霞浦、柘荣、寿宁、泰顺等县的交界地区活动。1935年1月,中共安德县委还在福安西北部的社洋一带新建了一个区委。福安的基层党组织也大部份转入秘密活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收复失去的苏区。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闽东临时特委和闽东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马立峰、占如柏、叶秀蕃等相继牺牲,苏区范围日益缩小,党的大多数基层组织解体消

亡。面对恶劣的环境，严峻的形势，闽东党组织领导人叶飞、阮英平在1935年5月充实了临时特委的领导力量，并于同年8月正式组建了中共闽东特委，领导闽东人民进行三年游击战争。

中共闽东特委领导三年游击战争中，在组织建设方面主要是恢复和建立党政军组织。1935年5月，被敌人“围剿”破坏的中共安福县委，由马步周重新建立后，9月即在福安东区的荷洋、黄潭等地建立和恢复了2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8月新建立的中共宁寿县委，其活动范围大部分也在福安；转移到福安、寿宁、泰顺三县交界地活动的中共福寿县委也于福安北区的泰逢、蛇头等地恢复和建立了2个区委、区苏维埃政府；转移到福安与霞浦交界地活动的中共福霞县委也在福安东南区的溪柄甲甫成立了一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是年底，特委又在福安城关建立了一个临时区委；1936年2月，福霞县委又在福安南区的溪尾一带建立了一个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安德、福霞、福寿、安福、宁寿等边区县委及福寿县委领导下的福安境内的2个区委还建立了游击队，形成了既不同于1934年的苏区，又不同于游击根据地的新的苏区。这些新的苏区的党、政、军组织根据中共闽东特委每一个阶段的战略部署及制定的决策，贯彻特委“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新区，同时对内恢复老苏区”的方针，为保卫闽东游击根据地、创建新的闽东苏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闽浙边临时省委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全省范围内部署了肃“AB团”的工作，中共闽东特委根据省委的部署也开展了肃“AB团”运动。从1936年初到同年秋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里，特委领导就有二三个月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肃“AB团”运动上，从党内到党外，从军队到地方，从特委到农村党支部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这一运动，被杀害的干部、战士、党员、群众达四五百人。这个时期，仅福安县错杀的就达135人。其中有曾任过闽东特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的郑宗玉，福寿县委书记占嫩弟、缪明出，中共霞浦县委书记郭宗如，闽东独立师第一纵队政委林金书，第三纵队政委缪英，宁德县委书记陈鸿，原闽东临时特委委员、闽东团特委负责人之一的阮肖远，中共福寿县委委员郑细茄。肃“AB团”运动使福安党组织的元气受到很大的损伤，影响了党组织的发展进程。当年曾任闽东特委保卫分局长的范式人1959年7月21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说：“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党对社会肃反没有放松，也没有什么大偏差，最大的错误是内部肃反问题。……有人说当时内部肃反的目的是对的，而是方法不对头，这是不对的。当时我们的肃反路线是错误的。这事情是搞错了，好在没有第二次再犯”。

由于国民党当局派大部队“围剿”，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原在福安邻县交界地区活动的安德、福霞、福寿、安福4个边区县委到1936年底前后也转移到邻县去活动。1937年4月前后，由于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或牺牲、或自首叛变，这4个县委相继解体消亡。福安境内的党的基层区委的主要领导人也大部份牺牲，除福安城区临时区委坚持活动外，其余的区委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动。福安的党员中的一部份人参加了闽东独立师随军活动，大部份人则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福安县委于1937年9月重新建立。县委根据中共闽东特委制定的“背靠农村，面向城市发展，推动抗战，巩固根据地”的方针和“白皮红心”政策，大力发展党员、恢复党组织。在1938年1月恢复了2个基层区委的基础上，4月又在湾坞乡半岭村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布置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不久后恢复建立了2个区委和一些基

层支部。另一方面根据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团结福安县长程星龄、秘书朱少希，派遣了十几个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福安县抗敌后援会，实现了县委“争取领导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推动抗战”的部署，掀起了福安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使福安成为当时福建省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及时掌握敌人情报，县委又通过程星龄、朱少希的关系，以合法手段使部份党员当上了福安县的区、保级领导职务，掌握合法权利，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展各项斗争，在一些基层政权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44年3月后，县委又在中共党员、时任福安县长的胡允恭（邦宪）和中共党员、时任县田粮处副主任骆何民（钟尚文）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实行“白皮红心”政策，把党的统战工作引向深入。县委通过胡允恭，选派了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国民党的政府科室及区、乡、保、甲职务，开展合法斗争，通过制造和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打击了汉奸势力、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顽固势力，以及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促进了抗日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1938年2月初县委书记郭文焕上调特委工作后，到3月7日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县委个别主要领导人表现不好，县委书记曾二度更换。194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福安党组织曾遭到一次较大的破坏。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更加猖獗，组织闽浙赣绥靖指挥部，集9团兵力紧逼我闽北闽东地区。闽东党组织根据中共福建省委“隐蔽精干”的指示，全部转入秘密活动。1942年3月，中共闽江特派员黄森回福安建立中共福安临时工委。同年11月，闽东游击队长吴安秀叛变投敌，率队到处搜捕我革命同志，形势紧张，黄森于1943年8月返回福州，福安县委工作由阮泊祺等同志坚持。1944年3月，闽江特派员孟起到福安成立中共福安县委，直至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福安县委曾恢复和重建了4个区委，恢复和发展党员200多人。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福安县委书记孟起回到福州后，由于发生了“羊枣事件”，骆何民受牵连被捕，胡允恭被免职离去，县委通过胡安插在国民党福安县各级政权机关中任职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部份被撤换，党的“白皮红心”策略受到影响。但是，由于福安党组织坚决执行了省委“保持群众联系，加深敌人矛盾，强化自己力量，做到一般的根据地巩固起来，准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粉碎敌人进攻”的中心任务，党组织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比较巩固，在龙溪及附近村庄的活动还十分活跃。此外，县委在配合省委武装工作队筹款方面还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5年2月，闽江工委第二次派黄森回到福安担任县委书记，县委相应地加强了对城镇工作的领导，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同年6月，黄森违反地下工作原则被调回福州后，县委书记由阮泊祺担任。此后，县委通过派员赴廉村、砂溪、社洋、廉首、松罗一带及霞浦县的大南、小南一带，以单线联系开展活动，恢复了部份地区。

1946年冬，党中央发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人民武装斗争，南方要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后，1947年1月，中央福建省委改称闽浙赣区党委，并设立了城市工作部领导城市斗争。1947年3月，区党委派林立和关平山到福安成立城工部闽东临时工委。驻福安的闽东临时工委又于4月6日领导成立了福安临时工委。福安临时工委成立后，一方面派员竞选国民党福安县的乡镇长，以掌握权力，更好地开展工作；一方面开展了反霸、反特、抗税的“二反一抗”斗争，反征兵、征粮、征税、抽佃、抽丁的“五反”斗争，还结合当时全国城市运动的

特点，领导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同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发动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的“六·二”事变后，福安临时工委由于领导人叛变、自首而解体。

1947年9月中共闽东地委成立后，恢复建立了中共福安县委。不久，县委因二位领导人全部被捕而解体。县委解体后，城工部闽东临时工委又派员到福安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8年5月，省委“城工部事件”发生后，福安的党的基层组织 and 广大党员仍保持联系，继续发展党员，领导学生运动，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当局“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挺进江南，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为了打击国民党势力迎接解放，城工部党员开展了筹建武装的工作，于1949年6月建立了2支武装游击队，闽东人民游击队也积极做出部署。他们活动于福安全县四分之三的地区，所到之处均收缴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枪支，瓦解了这些基层政权，并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把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带给福安人民，为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7月19日，挥师南下的第3野战军31军93师278团解放了福安县城，21日又占领了国民党福安当局苦心经营的最后一个堡垒赛歧，福安全境宣告解放。7月24日，闽东人民游击队派黄垂明率部抵达福安接管，7月25日成立了福安县人民政府。接着，县人民政府又在政府内设立了党支部和5个工作机构，8月又建立了14个乡的政权。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福安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1929年福安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到1949年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福安人民整整奋斗了20年，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福安全县有318个村庄被烧毁，被杀害的干部、战士、群众3万多人，其中已被评为烈士的就有2265人。他们的革命业绩、奋斗精神，永远激励着福安人民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9月19日，由山西太岳地区抽调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6大队”的南下干部到达福安赛歧，与黄垂明等地方干部胜利会师。稍事休整后，大队领导传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决定，并宣布由山西省晋城县组建的第1中队120多位同志到福安接交。黄垂明同志汇报了福安情况后，24日，中共福安县委、福安县人民政府在赛歧成立。27日，一中队干部抵达福安城关，并立即开展工作。

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福安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作者单位：中共福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